

# Ideas and Men: The 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美] 布林顿 著

## 西方近代思想史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Ideas and Men:  
The 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

 **西方近代思想史**

六点学术

[美] 布林顿 著 王德昭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近代思想史/(美)布林顿著,王德昭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

ISBN 7-5617-4387-4

I. 西... II. ①布...②王... III. 思想史-西方国家-15世纪-20世纪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8762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及文章中作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 民国系列

### 西方近代思想史

(美)布林顿 著

王德昭 译

统 筹/许 静

责任编辑/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李 瑾

出版发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021-62865537 传真:021-62860410

印 刷/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0 月第 1 次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1.125

书 号/ISBN 7-5617-4387-4/B·241

定 价/28.00 元

出 版 人/朱杰人

六点学术·民国系列

## 出版说明

被西方和东方的列强强行拖进现代化以来，文明中国的变化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山河如此，学术亦然。然而，新的中国收拾河山、重整乾坤，仅仅百年，气象焕然。

新的中国是无数先辈用一己生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斗中换来的；同样，新中国学术的基础是无数先辈学人在惶然多难的民国三十多年里奠定的。费孝通、王力、吕思勉、杨树达、蒙文通、朱生豪、罗念生、朱光潜、徐梵澄……数代鸿儒，无一不是在艰难时代以一己生命赓续中国文明之线——“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他们身后，如斯学人屈指难数。

不忘前贤、重刊旧籍，是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者应尽的义务——欧美国家凡有文明历史感的出版社，无不把重刊旧籍作为本己要务。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六点学术”推出这个系列，不仅为了纪念我们的学术父辈们曾经经历的那段艰难历史，也因为无论中学抑或西学（尤其翻译），都有即便当

今学术也未能有所速的成就在焉，值得珍惜和承继。

重刊民国时期学术成果，实非什么创举。可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名人”们的书反反复复、名目繁多地编印，少有出版者理会晚清和民国时期好些兢兢业业、深造自得的中坚学人，造就了更多历史“失踪者”。重刊旧籍，除了挑选书品时眼界需要更宽些、更细致些，敬重前贤的态度同样重要——影印本一类做法，无异于让旧籍重归故纸。“六点”的做法是：重新排版、校订文字（明显的错字、标点）、统一译名（不少人名和术语的译法，今旧差别很大）——从而，学术父辈们的心血将继续滋养后来学子。

“六点学术”有心用后现代的纸张和排印技术挽救前辈们的故旧文稿，盼学界有心人鼎立推荐、匡正谬误，一起来寻回我们丢失了的学术父辈们的书籍。

点点

2005年7月7日

## 导 言

一册在二十世纪中叶撰写的思想史,即使起首不作一番辩解,也得略加解释。因为在我们近代思潮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思想没有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当然,这一不祥的两歧之论,一部分根本不是真的两歧之论,而只是在不甚正当地玩弄“思想”二字的(至少)两重常用的意义:把思想当作“观念”或“概念”,当作某种我们已有的东西,和把思想当作“理想”,当作某种我们想要获得的东西,某种“更好的”东西。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说法使上面的说法更明白一点,那就是,作为我们近代心智传承的一部分,有一种普遍的观念或信念,认为抽象思想,关于真、善、美、人生之意义与目的的“哲学”思想,在这一世间的人或人群的现实行为中不是重要因素——或根本不是因素。其间是有一种具体而微的两歧之论存在——否认这类思想对于人有主动势力的观念,其本身便

必须采取一种“哲学”思想的形式。但这实在只是恼人而无关宏旨,根本上不过承认人虽然有更粗浅的或更精微的传达方法可用,但他们不禁时时想用逻辑思维、用明白的“言语”来传达意见。

并非所有我们近代西方文化中人,都不承认这类有关人类命运的一般的或抽象的思想有主动势力。关于这类思想的重要性的论争仍在进行,美国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以一句名句形容作“软心肠者”(the “tender-minded”)和“硬心肠者”(the “tough-minded”)之冲突的无穷尽论争的一面。在软心肠者看来,因为人思想——尤其他若是尽往足够崇高处思想——所以他存在,或仍将存在;在硬心肠者看来,因为人存在——尤其(我们必须配称地加上)他若是足够精明世俗,足够“现实主义的”——所以他思想,或仍将思想。如果我们举一个具体的实例,则论争的性质当更加明白。

第十九世纪末叶,在法国研究 1789 年的他们自己的大革命的历史学者间,关于这次革命所以爆发的原因的解釋,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的导火线是由于一册在其他方面并不十分重要或十分透彻的著作的发表,便是罗昆(Felix Rocquaint)的《革命前的革命精神,1715——1789 年》(*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before the Revolution, 1715—1789*)一书。罗昆教授的论旨是这样:真正迫使法国人民叛变反抗他们的当局的,不是关于他们的权利、关于正义、关于平等的思想,不是第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如伏尔泰(Franç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狄德罗(Denis Diderot)、孟德斯鸠(Montesquieu)及他们的伟大的英国先驱者洛克(John Locke)数十年来曾经显得如此成功地撒播于法国人民间的思想。迫使法国人叛变的是现实的具体

的俗世生活的艰困,实在是穷乏和痛苦。罗昆说,法国人之所以反叛,是因为他们的肚子和钱包都空空如也(因为是一个法国知识分子,他说得自然还要文雅一点),而遂认为政府应该对他们的苦境负责。书评作者和一般的评论家更来铺张这一论旨。他们大多数同意,如果我们真想明了法国革命为什么爆发,我们不要去求之于哲学家的著作,他们毕竟只是搬弄字眼,大半是一般法国人不能了解的大字眼,而应当去求之于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纪录,在其中我们将会找到使一般人民行动的真正原因。特别是我们应当去求之一宗对于历史学者真是非凡的意外收获的材料,为民间申诉疾苦之官方纪录的《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s*),这是当1789年时在各处城镇和村庄集会的公民所拟具的一大堆文件,作为他们选来出席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的代表的指导;至于三级会议,则是法国古老的中世的国会,而这次是1614年以后的第一次召开。在《陈情书》中,我们将会知道,真正使法国居民感受苦恼的不是缺少一部宪法,不是他们的君主专制和一个如像新兴美国那样的自由邦相比显得政治落后和有失公平,不是任何其他属于思想领域的缘由。使他们感觉苦恼的是任意课征的重税、恶劣的道路、时时发生的饥谨、各种各样已经不合时宜的封建义务、政府加于自由企业的重重约束和限制——一言以蔽之,真正有切肤之痛的具体疾苦。

自然,在那些认为革命的法国人是受比较更崇高的原因所推动、是受最后总括在“自由、平等、博爱”的著名口号之中的一类思想所推动的人士方面,对于上述的论旨决不默尔而息。虽然,要到1906年,才有另一位教授卢斯当(Marius Roustan)发表一册称为《第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与法国社会》(*The Philosophers and*

*Frenc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的著作,而提出了对当的答覆。卢斯当的答覆之所以特别成功,是因为适合第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舆论的趋势,他并未采取一种和罗昆的唯物论见解极端相反的唯心论的或“软心肠的”立场,而只坚持主张,纠合法国人使在全国的规模上一致行动的,是在一个身受物质生活疾苦的社会中发生作用的哲学家的思想。罗昆曾不辞辛苦,以说明从1715年以下,民间的不满和现实的困苦在法国造成了地方性的不安,发生一连串的小规模纷扰、面包暴动,以及我们应该称之为政府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行政部门和残存的地方立法团体之间的争吵。卢斯当用来反击的论旨是说,正就是这班哲学家的思想,才使得1789年获得成功的全国的伟大起事和同世纪早先毫无结果的纷扰,大不相同。这班哲学家的工作要到同世纪后半才告完成——卢梭的得意时节是1760年代的十年——而总需几十年工夫,他们的思想才会真正深入一般法国人的脑中和心中。在1750年代是有面包暴动,但要到法国人所企求的有过于面包,要到他们的思想家教他们去企求一部新的宪法、企求他们的自然权利,要到他们有了新的美国及其权利法案的榜样,他们才有了使真正革命成为可能的一致行动的准备;关于新美国及其权利法案,美国使节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在法国谆谆宣扬,他自己在法国人的心目中便是理想的哲学家,未曾变坏的自然的赤子。

在本书中,我毋宁取卢斯当的立场,而不取罗昆的。实在,我们基本的见解是这样:为了解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关于是否思想使人行动或物质条件(欲望、利益、“冲动”,或用马克思主义的用语说来,“生产手段”和因之而起的“阶级斗争”)使人行动的全

部论争,在根本上不特无益,而且不得要领。没有一个自动车工程师曾梦想去争辩是汽油还是电火使一部内燃机发动,自然更不用说汽油或电火孰先孰后的问题了。思想史家也无需去争辩是思想或是利害在社会关系上使人行动,毋需去争辩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不兼有汽油和电火,便没有行动的机器;不兼有思想和利害(或欲望、或冲动、或物质因素),便没有活的、行动的人类社会,没有人类历史。

思想既这样为全部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一种意义上,全部历史也就是思想史。但在本书,我们决不想为几乎不可为之事,而去写一部通史。首先,我们要把自己局限于汤因比先生(Arnold Toynbee)在他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称之为“西方社会”的一部分人类,也就是欧洲和海外为希腊罗马社会之继承者的男男女女的集团,他们的历史开始于基督教时代初期日耳曼民族的侵入衰替中的罗马帝国;而在这一西方社会的范围内,在时间上我们要把自己局限于它的“近代”,约略相当于自第十五世纪中叶以下的五个世纪,而依习惯上的历史分期,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划出从中世到近代的过渡。其次,我们要把自己局限于一类思想,为一般人对于有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对于真、善、美、效用、人在此世应过的生活等所持的思想。用一种方便的虽然完全不是严密的区别来说,我们是研究意见,乃至公共意见或舆论,而非研究形式思想。

但是我们必须从扬名于公认的各学科史——哲学、神学、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为后代开风气的大思想家的学说着手,而且将始终主要贯注于此。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兴趣并不十分在乎这些思想本身的源流和发展,并不十分在乎这些学科的

专门史家所当关心的方面,而是在乎这些思想在一般人生活中所曾发生的作用,在乎这些思想在世间所曾完成的工作。例如,我们将多多讨论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尔文(John Calvin)的思想,但主要并非从形式神学史家的观点,而是从一个对于那千百万虽然往往——或许真是一竟——未曾真正读过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但是曾经受他们著作影响的人民感觉兴趣的历史家的观点。对于基督新教——或马克思主义、或民主政治——我们的兴趣所在,也是在它的作为许多人所相信、所共有的对于大问题的——一组解答,在它的作为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一种人生观。

这确是一桩极其困难的工作,要比精密分析大思想家自己的思想还困难得多,因为单就一般人大多数都无所表达、或至少都没有留下当时的、直接的纪录为图书馆所收藏而言,已经可以想见其困难。虽然,对于我们在本书所谈及的五个世纪,比之对于更早先的时代,这事尚大可一试,即使只出以概略的形式。例如,我们无法知道一般雅典人对于柏拉图(Plato)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思想作何想法——如果我们是富有怀疑精神的,我们可以猜想他从未听说过这两位大哲学家。但是,由于近代一开始就有印刷术的发明,由于印刷术的使用自书籍推广到比较廉价的小册子和单张印刷物,其后又推广到甚至更廉价的新闻纸和期刊,再加以识字人数的继续增加,我们在探究一般人的思想意见上,自然要有把握得多。已经收集的这类可供意见史之用的资料数量浩瀚,历史学者自然只能择要以举。但是他可以在取舍上求其允当,而更重要的,他还有不少学者的工作可供参考,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某些部分已经做了专门的研究。例如,他不必担心“幸福的追求”一语只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富有想象力的心智

所凭空虚构,在一般人中毫无反应。如果他翻读美国史的资料,他必将随处撞到这同一名言,而且由于琼斯先生(Howard Mamford Jones)的新著《幸福的追求》(*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一书的问世,他手头还有了关于这一名言在美国历代律师和法官心目中的意义的一项最精密和最巧妙的记述。

有一种观点我才加以驳斥的,认为我们在本书所涉及的这类思想,有关大问题的思想,对于社会中一般人的行为并不是起因果作用的动力。这观点的来源之一——虽然决不是唯一的来源——是由于相信平常人真是没有能力持有这种思想,相信只有“知识分子”才从事思想,尤其是“抽象”的、关于真、善、美的思想。推到极端,这一信念是荒谬的,而且可能连最矜持的知识分子也未必认真相信。毫无疑义,平常人不发明意趣深远的思想,没有重要的“独创的”思想,而且事实上也并无如集体的创造性思想一类的事。便是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也不是发生于“民间”,而乃是无纪录可稽的个人或一连串个人的创造。同样毫无疑义,在人类智力的最低层,在白痴和最低能者群中,也谈不到我们在本书所意谓的思想。但是,所有正常的男男女女,乃至儿童,都能够而且确实持有思想。我乃至敢冒昧说,所有正常的人都是形而上学者;大家都多少想把自己放入一个“体系”、一个“宇宙”、一个至少超越个人及其环境之间直接的相互利用关系的过程;在所有正常的人,自觉缺乏或未能达到这样的理解的,终将造成一种形而上学的焦虑。

我回想起一次成人间的谈话,有一个五岁大的男孩在场谛听。谈到某处,孩子得到了他所渴望的插入成人世界的机会。父亲让孩子发言,然后随口解释说:“这是七年以前了,是在你出世

以前,乃至在你成胎以前了。”孩子的脸上立刻现出一片空虚,马上便啜泣起来。要想描述他这时心里的思潮起伏,自然极无把握,但在那些话中必有使他深深激动的地方。如所有在他的年龄的孩子一般,对于“在你出世以前”一语,他大致当能容易看过;但即令他的父母和大多数进步的父母一样早已尝试让他知道生命的事实,“乃至在你成胎以前”一语却一定令他不知所措,令他不仅面对一个难题,而且是一个如许多日常问题一般他所必须设法解决的问题,但却赋有根本的神秘性。在当时,则宇宙间只有他孤独的一人——实在,他甚至并没有一个宇宙;这是一种严重的形而上学的焦虑。

然则,人人都有一套形而上学——或者,如果我们喜欢简明一点的说法,人人都有一种人生观为他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并非人人有同样的人生观。我们大家都有足够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知道在人类的各种族间基本信仰的歧异如何巨大;而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我们更不能不有见于每一个单独的政治组织单位中基本信仰的距离和变异。诚然,在近年来,我们的预言家、专栏作家、布道家、一般知识分子,对于这种歧异的危险益发大声疾呼,促人猛省。他们自己所一一举出的不满和补求方案,其歧异之甚,和他们所不满的歧异一般无殊;他们有的要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或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有的要我们做杜威(John Dewey)、罗素(Bertrand Russell)或马克思(Karl Marx)的同道。但在最近几年来,主张我们美国人、或乃至所有“自由世界”的公民就在这些大问题上应该意见一致的要求,确似乎有日见增强的趋势,而这些大问题,就可见的纪录看来,使西方社会的成员纷纭殊状,在今日至少当不下于在五百年前。我们一

再被告知，共产党有这种意见一致。他们知道自己在基本原则上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Leninism)——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给了他们一切应有的解答；他们没有形而上学的焦虑。

我不相信在俄国果真在属于形而上学或宇宙观的大问题上有这种意见的一致，更不用说在其他的欧洲附庸国家。做一个软心肠的马克思唯物论者，乍看虽会觉得矛盾，但詹姆士的软心肠与硬心肠二元论，似乎在俄国也还可能适用。再者，从我们得自铁幕后的零星报道看来，就是公教教会也尚能立足于波兰等附庸国家，而正教教会甚至尚能立足于俄国。当然，在这些共产国家的基督徒为求公开存在，他们必须从事妥协，但组织化的基督教会之能和马克思主义的否认任何超自然秩序的存在、否认任何唯一神论或自然神论的神的存在妥协，自有一定的限度。一个无神论的基督徒不只是前后矛盾；他简直就是荒谬。

虽然，我们在本书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并非俄国或任何极权社会事实上能从它的成员得到多少如已故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讽刺小说《1984》中所建立的——在纸上——那种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我们在本书所关心的乃是当前西方所有的无可否认的多向性(Multanimity，一个一目了然的字，但在英语字典中还没有得到充分承认)。我个人的见解认为，这种多向性不仅丝毫不是弱点，而且在事实上还是我们的伟大力量之一。但我充分明了，我们今天的思想见解已不同于第十九世纪中叶，当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的《论自由》(*On Liberty*，严复译《群己权界论》)一书中可以断然主张愈多分歧——当然是思想上的分歧——愈好。所有专门对于我们的多向性表示杞忧的人

莫不过甚其辞,但他们也并非就是神经病者。在这里是有一个真的问题——或不如说一连串问题——存在。没有人会为第二十个世纪——至少就它的前半来看——写一册书,而如已故马尔文(F. S. Marvin)为他的第十九世纪概观所选的名称一般,题名曰《希望的世纪》(*The Century of Hope*)。但是,以一个如像《焦虑的世纪》(*The Century of Anxiety*)一样的名称用之于第二十个世纪,到第二十一世纪看起来,或许也会发现其不正确;但焦虑确实存在,就在目前。

自然,我不至于如此愚蠢狂妄,会相信在本书中我能解决这些困扰我们的问题,或对于一般大问题能给予任何新的更能满意的解答。尤其,我不愿被认为和比较天真的逻辑实证论者——或逻辑分析论者、或语意学或表意学的热心信徒——亦步亦趋,他们在最近几十年来一直告诉我们,因为人们从柏拉图乃至摩西(Moses)和伊克拿顿(Ikhnaton)以来一直问着这些大问题,而所得的是各种各样不同而相互冲突的解答,所以我们应该一致认为它们是“无意义的”,而不再去追问它们。实在,形而上学乃是一种人性的冲动或欲望,要人们放弃形而上学,其不中肯,有如要他们放弃性关系。固然有人能完全戒绝形而上学,正如有人能完全戒绝性欲一般,但他们乃是例外。而如像有人克制性欲的结果实际只是转向无益的发泄,克制形而上学的人也往往如此。

我在本书所曾致力的,并不想对大问题给予新的或乃至旧的解答,而是一项比较卑微得多的工作。我曾力图显示我们的多向性在近代曾如何发展,我们的解答在深度和周延上曾如何变化多端,我希望多少能稍效微劳,帮助那些觉得我们正处在一种不可忍耐的怀疑和不安全状态的人们,减轻他们的一部分焦虑。

因为和任何其他一种历史一样，思想史也可以——虽然并不一定——有安抚人心的力量，告诉我们并非只有我们如此，别人同样也曾感觉他们面对了可怕的“非此即彼”的歧路——而结果发现在两者之间竟有着几乎无限的可能机会，别人同样也曾感觉世界的末日已近在目前——而结果发现世界竟并未终结。任何人，即令完全没有受过历史研究的实际训练，也能靠勤勉和一个好图书馆的帮助，从柏拉图以下历代贤哲之士的言论著作之中，辑出几乎毫不间断的一长列文字——这些文字曾经告诉它们的读者或听者，他们的世界是无可再坏的世界，时候已经太迟了，这不是他们所想的时候，再也没有工夫挽救了。预言凶事的人总是对的——而也总是错的。

但我也不愿便以此自满，对于许多人这一定只是颇为空洞的慰藉。我曾试图这样来表现近代西方变化多端而相互冲突的人生观的原始和发展，首先希望读者可以由此比较更明白地看出、更圆满地拟定一个使他们自己满意的人生观；其次，希望读者由了解别人的人生观，而更知道和他们好好相处。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至少，我们必须学会同意意见的不同——达于某一限度。我们必须知道，在任何可以行得通的未来，我们有的最好的朋友会以我们所认为丑者为美，以我们所认为愚者为智，以我们所认为罪恶者为正义。如果在我们朋友——和我们敌人——方面这是真的，则在非友非敌的许多人方面自然更是真的，这许多人我们只从间接然而普遍的思想传播中知道，如在报章、舞台或讲台、无线电波、所有为我们世界之显著特色的集体传递媒介所见的那样。

一个意见一致的民主社会——便是说一个民主社会，它的千

百万成员在大问题上完全意见一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就我们生长于其间的世界而言，也的确不像会闯入今日的政治。确实，我们可以在心中想象人人在大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社会；许多——或许大多数——乌托邦(Utopia)便是以这样的意见一致为基础。但是莫尔(St. Thomas More)在选择他的书名——《乌托邦》，希腊语为 outopos (无何有之乡)——时却想必意在讽刺，而这讽刺，四百年来并未减轻，而反加深。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和人类学家知道世间真有社会，它们在属于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美术、所有这些美国人喜欢认为表现他们“人格”的方面的基本问题上，确实远比今日的西方社会更多接近这一种的意见一致。大多数“原始社会”，对于宗教和人生意义显然表现了一般的意见的一致。在中世西方社会，在经院哲学蔚盛的第十三世纪，基督教宇宙观也曾为社会完全接受；在一种意义上，所有该社会的成员都是基督徒。但必须承认，他们的表现为基督徒，其所取的方式各殊；而且，在对于基督教宇宙观的一致同意之下，却进行着激烈而也富有启发性的神学和哲学的全面论争。在大多数近代初期的西方国家中，当时阶级区分还几乎被看成是一件天然之事，贵族、有教养的布尔乔亚和农民可能抱有十分不同的人生观，几乎互不相容的人生观；但是他们相互离立的事实——一直要到第十八世纪的革命扰乱了这种阶级组织——就使他们的人生观未曾发生真正的冲突，未曾要求同意意见的不同或相互容忍。最后，极权的理想确实要求在本原则上完全一致；而极权的实施，则谨慎一点说，表现出了一种以强迫加诸不同意见者来实现极权理想的倾向。

然而一个民主社会不能取法于以上的任何一则，而依然成其